

---

# 对皖南事变的另一种反应

## ——《大公报》、《申报》有关报道评析

石建国

---

皖南事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对国共双方、中国的抗战大局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所引起的震荡也是十分剧烈的。对这一事件,史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已进行过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相当宏富。但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过去研究皖南事变时,著论者很少重视国内舆论界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对报纸的言论关注不够审慎,造成了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事变发生后似乎舆论界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同情,并一致谴责国民党的不当认识。报纸是舆论界最重要的载体,其言论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并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倾向,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对报纸对皖南事变的反应进行研究,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笔者因条件所限,仅选择了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公报》和《申报》作为对象,就其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有关报道作一回顾和评析,以图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皖南事变及其善后问题上所持的态度。

—

在皖南事变前,《大公报》和《申报》,对新四军持有不同的态度。

《大公报》是一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创刊于1902年,总部设在天津。七七事变后,天津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被迫在

天津停版。迁至武汉后,于1937年9月18日开办了汉口版。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大公报》即于同年12月开办了重庆版。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大公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民营报纸中,销量最大、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甚为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所喜爱。<sup>①</sup>

《大公报》最重要的特色是社评。作为该报表现其政治立场的灵魂的社评,在海内外有着极高的知名度。<sup>②</sup>加之,因遵照国民政府的命令和受纸张奇缺的影响,汉口版、重庆版《大公报》都是一日一大张,由此,更突出了《大公报》社评的重要性。<sup>③</sup>

但是,就是这样一份以‘客观、公正’自居,有着重要影响的报纸,在皖南事变以前的报道或社评中,对国共通过谈判将江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事实竟未置一词。在笔者仔细翻阅了这段时期的《大公报》后,也未见有公开报道新四军在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或介绍新四军的任何消息。这与《申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总部设于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上海沦陷,该报又拒绝接受日本新闻检查,于1937年12月14日被迫宣布停刊。此后,《申报》先后于1938年1月15日——7月31日,3月1日——1939年7月10日开办了汉口版和香港版。1938年10月10日,《申报》又重新在上海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复刊。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于10月12日正式颁布了新四军的番号。对于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申报》以积极的态度予以了重视,并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如 赣湘浙皖闽边境

---

①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95年8月,第57页。

② 陈纪滢:《论大公报》,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1期。

③ 同上。

游击队改编效命抗战放弃过去一切活动并服从政府随全国友军及八路军之后》的报道,就初步使社会对即将改编组成的新四军有了认识。在这篇报道中,还介绍了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的项英致书各边境游击队的内容:“我们因民族危机的紧迫,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达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于是取消过去苏维埃运动,和暴力夺取土地等政策,以求得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sup>①</sup>这样的报道,更使得社会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接受改编的原因和目的有了了解。在另一篇题为《项英率领之红军参加抗日之经过》的报道,又全面介绍了接受改编的红军游击队及其奔赴抗日前线的过程。<sup>②</sup>此后,《申报》对新四军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报道了新四军组建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的消息。如:《江南三角地带大规模游击战主要目标为各交通线部队包括新四军等》(1938年9月12日香港版)、《新四军声势浩大与日军交战百五十次兵员已增至六万余人日军伤亡在千人以上》(1938年12月11日上海复刊)、《大江南北展开游击战争新四军纵横京沪各地日寤寐不安疲于奔命》(1938年12月17日香港版)、《新四军战绩——兵额十万蔚为劲旅驰驱南北屡建奇功》(1940年1月5日)、《甯沪路游击战新四军出动》(1940年4月18日)等多篇。

第二,报道介绍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及其活动。例如:有关于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报道,如《新四军逼近京芜叶挺接见外记者》(1938年10月30日香港版)、《新四军军长叶挺奉命回粤参加游击战争》(1938年11月30日香港版);有关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报道,如《项英之印象与谈话——项氏曾参加工人运动成绩显著竭力赞同统一战线意志极坚强》(1939年1月15日)。此外,该报从1939年3月28日——4月3日还连续7次以《新四军一年来抗

① 《申报》1937年9月30日。

② 《申报》1939年1月4日。

战经验与教训》为题刊载了项英总结新四军抗战经验和教训的演讲稿。

第三,多层面多角度介绍新四军的情况。《申报》从1939年1月6日起连续刊载了英文《大美晚报》特派员贝尔登介绍新四军的通讯,文中有介绍新四军士兵训练,士兵生活及募兵状况的文章,如《新四路军注重士兵战术训练士兵并非招募而来纯属是自动入伍的》(1939年1月6日)、《新四路军士兵生活之一斑——每日受军事政治指导性的问题实无暇想及》(1939年1月19日);有介绍新四军内部组织状况及政治工作的文章,如《新四路军分政治军事两系统政治制度为该军生命线》(1939年1月8日);有介绍新四军开展群众工作的文章,如《新四路军注重民众间工作——到处得民众协助作战政治部极力组织民众》(1939年1月11日);有介绍新四军对敌瓦解工作及俘虏政策的文章,如《新四军对敌人工作一斑——散发日文招贴与日语口号香河被俘后参加政治工作》(1939年1月13日);有介绍新四军战术的文章,如《新四路军之战术——秘密神速袭击日军》(1939年1月16日);有介绍新四军与地方关系的文章,如《新四路军表示不干涉地方行政并称无独立经济政策》(1939年1月22日)。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申报》有关新四军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都比较广泛和丰富。不过,《申报》对新四军的报道到1940年4月份就完全消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皖南事变发生前夕。这恐怕与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相关。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限共”的方针,设立“防共委员会”。1940年以后,国共两党关系渐趋紧张,《申报》受国共关系变化的影响,在列布有关新四军方面消息时不得不谨慎从事。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大公报》的反应又与《申报》有所不同。1940年12月19日该报发表篇名为《政治团结军事统一》的社论,开篇即认为“我们内部还在谈论着团结问题,甚

至在军事上还有参差失常的现象”是一种不幸。并认为：“问题不在政治方面，也可以说不在党派方面，乃在军事方面”。“军队只能有一个意志，一个命令，一个行动，在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下向同一目标进行”。社评最后写道：“我们愿更郑重声明：我们为了保障抗战的胜利，在政治上要至诚至敬的吁请全国各界的团结，在军事上也至恳至切的要求全国军队的统一，绝对服从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一军不能例外。”<sup>①</sup>这篇社论正是在国共两党关于新四军问题激烈争论时发表的，它的矛头所指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以上看出，在皖南事变之前，《大公报》和《申报》在有关新四军问题上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大公报》还是《申报》，局势恶化导致出皖南事变，却都是始料未及的。

## 二

1941年1月4日晚，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绕道北上，于5日到达茂林地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6日，蒋介石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为由，命令黄河以南国民党军队以武力“强制执行”，“迫其就范”<sup>②</sup>，结果，新四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一部突围外，大部战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死难。“皖南事变”发生。

1月7日《申报》刊载的来自路透社的消息，内称：“路透社顷自负责方面探悉，一部分共产军队，已开始移至总司令部所指定防地之消息传来后，关于共产军队之措置问题业已告一段落……据最近消息，表示一部分军队已开赴列为第一防段调防之阵地。”<sup>③</sup>

① 《大公报》1940年12月19日。

② 《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11册，第125页。

③ 《共军一部开始移防》，《申报》1941年1月7日。

这是两报对新四军移防消息的唯一报道。但由于国民党新闻封锁对于新四军于移防途中已遭国民党军队围歼的事实,两报均未报道。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令和军委会负责人的谈话。第二天,发生皖南事变的消息才见诸各报端。‘皖南事变’的消息一经公布,就立即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对这一严重事件,新闻界如何表态,持何种立场,无疑在当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设在重庆的《大公报》,深感局势严峻,处境险恶,虽于1月18日刊载了“通令”和“谈话”,但素以社评见长闻名海内外的《大公报》此次却一反常态,没有发表社评,采取了冷处理的手段,以保持沉默来显示了自己的立场。

然而,解散新四军事件毕竟是一件攸关全国抗战大局的大事,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有重要影响。作为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对此一事件乃至时局的发展持何种态度,《大公报》不能不有所表示。在内外压力之下,《大公报》终于在1月21日发表了《关于新四军事件》的社评。这篇社评通篇未用“叛军”字样,还赞扬了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的态度。并指出:“我们敢信中共现时必仍然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在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之下,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或因求治之急而近乎激,非但可谅,亦且可敬”,奉劝“国民党尤其要贯彻孙先生天下为公的伟训,努力造成清明公道的政治”。最后,社论认为:“就政治观点以论新四军事件,这部分军队原质本有微异,而且是抗战发动后才加入国军的战斗序列的,我们虽不必请求政府对之另眼看待,却报希望统帅部之慎重处理,于整肃军纪之外,不可偶或渗入感情的成份。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和蔓延!”<sup>①</sup>社评虽然认为

<sup>①</sup> 《大公报》1941年1月21日。

“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未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以武力解散新四军的做法,但字里行间还是隐含着对共产党的同情。陆军喉舌《扫荡报》于次日发文,对《大公报》“主张宽恕与新四军事件有关之共产党领袖”的观点予以辩驳,“力言严明纪律及惩处负责者为必要”。对此,《大公报》在25日刊发了一条《新加坡一侨胞来电拥护本报二十一日社评主张》的消息作了应答。

如前文所述,在皖南事变前,《申报》对新四军予以了积极的报道和热情的颂扬。此次事变的发生,使该报猝不及防,十分被动。1月18日,《申报》和《大公报》一样,也刊载了“通令”和“谈话”,且未发表任何评论。所不同的是,这份重新闻轻言论的报纸,连续报道了国内外对此事的反应。如:《中央日报扫荡报论解散新四军为贯彻军令之断然手段与政治及其他部队无关》(1941年1月20日)、《对新四军解散事苏使馆未提诘问所传种种绝对子虚叶挺如何处分未定》(1月21日)、《解放新四军案应极慎重——大公报之主张》(1月22日)、《谕各报注意国内政局》(1月23日)。此后《申报》停刊5天,这大概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舆论界中绝无仅有的。该报在1月24日—29日期间曾短暂停刊<sup>①</sup>,笔者仔细查对了前后的序号,发现停刊前和复刊后的序号是相接的,也未发现能导致停刊的其他因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由皖南事变造成的。

由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有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而引发内战的危险,加之海内外舆论对此反应强烈,蒋介石为息事宁人,使事态不致进一步扩大和激化,在1月27日发表谈话,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sup>②</sup> 蒋介石1月27日的谈话,对国内

① 此次停刊不见于介绍《申报》的各类文献。参见《上海图书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上海图书馆1982年12月编辑出版,第115页。

② 《蒋委员长对整饬军纪加强抗战的训词》,《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328页。

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报界对国共关系破裂的忧虑一扫而光,就是先前报界所持的犹豫谨慎态度也不见了,都立即对蒋介石的谈话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了拥护,并给予了积极报道。尤其是《大公报》和《申报》的变化最为明显。

《大公报》在1月29日以几乎整版的位置刊发了蒋介石的谈话,并在每一段重要内容前都加上了醒目的小标题,以突出蒋介石谈话的重要性。还发表了基调是拥护蒋介石谈话的《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评。在该社评中已全然不见了同情共产党告诫国民党的言词,相反,还把韩复榘石友三等“违命犯纪”的军阀与新四军相提并论,以证明蒋介石“解散部队取消番号”<sup>①</sup>的整饬军纪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申报》在经过短暂的停刊之后,也在蒋介石发表谈话后立即复刊。在1月30日的续刊上就刊载了蒋介石的谈话——《国府扩大纪念周席上蒋委员长之训词——检讨过去一年间工作说明解散新四军事件此举完全为整饬军纪》。1月31日该报继续以《国府扩大纪念周席上蒋委员长之训词——说明解散新四军经过》续刊了蒋介石的谈话。此举显然具有深刻的寓意,意在表明《申报》对“谈话”的重视。《申报》还一反过去十几天来小心翼翼的态度,特于同日针对解散新四军事件第一次发表了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社评——《新四军的解散》。在这篇迟来的社评中,《申报》的立场显而易见地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认为新四军的解散是“军纪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最后更认为“新四军存在之日虽不容否认其为一宗力量,然力量的估计必以服从纪律为前提,必以对于抗建的实际贡献为衡量。前提不立,则贡献等于零,估价等于零”。<sup>②</sup>《申报》的如此表态,完全是一种牵强附会的作法。其不顾历史事实看风使舵的痕迹十分明显。此后,《申报》继续报道了与皖南事变有关的其它消息,

① 《整饬军纪准备反攻》,《大公报》1941年1月29日。

② 《申报》1941年1月31日。



如：《中共提要求说渝无新闻》(2月5日)、《新华日报社评被删》(2月6日)、《宋子文对美记者之谈话——抗建期中国共一致对外惟蒋氏能领导全国作战》(2月7日)、《新华日报 不至停刊》(2月11日)等等。

综上所述，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和《申报》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果说在1月27日以前，《大公报》、《申报》对国民党的“过激手段”尚持异议，且有所不满的话，那么，1月27日以后，《大公报》和《申报》就完全换了一幅面孔，最终附合了国民党的立场，偏袒国民党的作法。这显然与我国史学界某些人所称的谴责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说法不符。

### 三

然而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尖锐对立，毕竟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就决定了国共关系的发展只能服从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的大原则，任何分裂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行为都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十分关注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在推动国共关系的修复和最终和解中，《大公报》和《申报》扮演的角色颇为引人注目。

国共两党在皖南事变后关于善后问题上的对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之时。

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参政议政共商抗日大计的政治制度，已成为全国团结抗日的象征。国民党极希望共产党代表能出席这次参政会，这样可以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得分，并向社会表明皖南事变确是“军纪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以挽回国民党的声誉。但正如周恩来一针见血指出的：国民党指责我们为“奸党”、“叛军”，如今不仅不道歉，还要我们来给你们捧场，“岂不是侮

辱”<sup>①</sup> 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以解决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 12 条为出席条件。为表示“仁至义尽”,后来又提出了新的临时办法 12 条。<sup>②</sup> 这样,中共代表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就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在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大公报》就刊载了配合国民党立场的言论,如《湘临参会电十八集团军希望恪遵军令》(1941 年 2 月 22 日)、《粤临参会电劝十八集团军服从命令》(2 月 23 日)。至 3 月 1 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正式开幕后,《大公报》围绕国民参政会的报道,其动向很是受人注意。就国共关系来说,这些报道主要有:《参政会昨日议决仍盼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不能接受任何参政员出席条件》(3 月 7 日)、《蒋委员长在参政会说明希望共党翻然觉悟切实履行诺言遵守建国纲领服从军令一致抗战以求早胜》(3 月 9 日)、《共党参政员出席条件》(3 月 9 日)。在参政会闭幕前夕,该报发表了《关于共产党问题》的社评。正如社评开篇所讲的:“这次国民参政会,有一件使社会挂虑的事,就是中共七参政员的出席问题。”3 月 6 日蒋介石发表意见后,参政会有两点决议:“(一)国民参政会机关不能对任何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二)切盼共产党参政员深体团结抗战的使命,坚守拥护统一的宣言,出席参政会,俾完善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大公报》的社评就是以上述内容为基调展开的。第一,社评完全赞同蒋介石的论点,认为蒋的说明其“根本精神则只是在希望共产党反省,贯彻团结抗战的初衷,以争取胜利的早临”。第二,认为共产党问题中一个最要之点,就是“军队国家化”,“无论如何,国家的军队只有一个系统,而不容有两个军令。这一点是绝对不容撼动的原则”。“我们至诚盼望共产党务必接受这个大原则”。第三,对于皖南事变善后问题,该报社评也赞同蒋介石

---

① 《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9 页。

② 同上,第 223 页。

石的主张,即交给国民参政会来公议处理,认为这是解决本问题的一个可能途经。社评最后指出:“我们认为,除了军队统一与军令贯彻应由最高统帅部全权处理,无庸讨论外,其余一切属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概可由参政会博采众议,研究方案,以求真正的解决。”<sup>①</sup>据此完全可以认为,《公报》对于皖南事变善后问题,其立场和态度与国民党已无二端。

此后,《公报》刊载了不少支持蒋介石政府劝说共产党的言论,如:《留日归国侨胞致电朱毛劝遵法令勿败纪纲》(3月11日)、《中枢对共产党态度英报认为合理》(3月14日)、《中山学社致电毛泽东等》(3月14日)、《沪教联会电共党参议员箴劝》(3月18日)、《沪市商会电共党参议员》(3月19日)、《荷属侨胞箴勉共党》(3月28日)、《萧伯纳谈中共问题赞成委座劝告》(3月29日)。这些言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要求共产党“以国家为重,切实履行前此之宣言,完成抗建使命”。<sup>②</sup>

与《公报》相比,《申报》为社会“荐言”的特色要淡得多,更加注意对各种消息的报道,但仍反映出了该报的立场和态度。

有意思的是,在参政会开幕前夕,《申报》有这样的报道:《共党代表将出席参政会议》(1941年2月24日)、《周恩来现仍驻渝》(3月1日)。在《国共两党融洽无间统一阵线益坚凝》的报道中,该报借外国观察家的口,认为“新四军解散一事……为国民党一部分人士所主张,大部分之国民党党员,并不预闻此事,故决不能认之为国共分裂”。而且,“下自农工,上至政府官员军队长官,从无有一人承认‘统一战线’有被分裂之虞者,即共产党领袖亦作如此想也”。<sup>③</sup>对国共关系作了乐观的估计。应该说《申报》的这篇报道是关于时局种种猜测的一种清醒剂,产生了良好的社会作用。

① 《公报》1941年3月10日。

② 《公报》1941年3月28日。

③ 《申报》1941年2月26日。

参政会正式开幕和结束后,针对国共关系及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申报》关于国民党方面言论和活动的报道,有《蒋委员长在参政会保证不再以武力制裁共党希望共党立即接受劝告改变态度国共问题在参政会中谋合理解决》(3月10日)、《中央限制共产党活动加强国家团结》(3月14日)、《已解散新四军改编竣事》(4月9日)等。《申报》在参政会闭幕后发表了《参政会中之中共波纹》的社评,认为,“在参政会里所表面化了的问题,虽似复杂,实以军令问题为其核心;其他问题仅许只是短长比较,独有国家军令的必须统一,则是古今中外所绝对的,在战时,尤其是绝对的绝对”。<sup>①</sup>这和《大公报》的言论如出一辙,是站在拥护国民党的立场上。

同《大公报》一样,《申报》也刊载了一些劝说共产党支持蒋介石的言论,如《促共党觉醒笃守往昔诺言多作自我检讨无逞意气——市农会整委员致电共党七参政员》(3月23日)、《荷属侨胞团体致电朱毛》(3月28日)、《关于中国问题萧伯纳发表谈话》(3月29日)、《市教育会等联名电致毛泽东等》(3月29日)、《全市各业同业公会致毛泽东等电深盼悬崖勒马笃守诺言共同奋斗完成抗建大业》(3月29日)。

关于皖南事变善后问题,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使国共斗争达到了高潮。但是,在国民参政会出席问题上所形成的国共对立的僵局,并没有维持多久。这年5月日寇在晋南发动中条山战役,外敌的存在和威胁立即把国共关系拉近了,成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润滑剂。而且日本侵略者的行动,成为人们检视国共关系的指针。

当中条山战役开始,并且整个战争吃紧的情况下,时刻关注国共关系的《大公报》即于5月21日发表了《晋南战争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列举了诸如日方广播:“第十八集团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等种种说

① 《申报》1941年3月14日。

法,虽认为大多出自敌人的捏造,但却“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而且认为,反证的最有力的方法,乃在于“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最后,该社评用反诘的语气指出:“现当晋境敌军未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呼吁“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sup>①</sup>《大公报》的言论等于说共产党不合作抗日了,要将破坏抗战的罪名加到共产党头上。对此,中共立即作出了反应。当天深夜,周恩来就写了致《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的信。5月23日,《大公报》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标题刊载了该信。并同时刊发了《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周恩来的信用事实批驳了《大公报》的种种不实之词,说明第十八集团军事实上是积极配合了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并郑重声明:“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sup>②</sup>而《大公报》的社评则为自己辩解,认为“我们前天的评论,其实只一句话,即期待十八集团军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以“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sup>③</sup>不仅如此,《大公报》还继续登载了《留港参政员致电朱德毛泽东促十八集团军对敌作战》(1941年5月26日)的电文,又发表了《问军事委员会》的短评,内称:“十八集团军是否业已协同作战?”“如已有协同作战的事实表现,请公布,以慰全国同胞之望;否则,也请说明真相,以便再加督劝”。<sup>④</sup>事实胜于雄辩,当十八集团军协同友军积极抗日的消息公布后,《大公报》也就偃旗息鼓了。而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由于国共事实上的联合抗日,也不再成为舆论的焦点。

《申报》在中条山战役所牵动的时局问题上的态度,与《大公报》保持了一样的立场。《申报》在这方面的报道有:《十八集团军应

---

① 《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

② 《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

③ 《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

④ 《大公报》1941年5月29日。

赴援中条山——大公报昨日社论呼吁》(1941年5月22日)、《共军进攻晋南日军与中央军合作——周恩来函大公报声明》(5月24日)、《张一等联电朱毛》(5月26日)、《周恩来吁请军民团结一致粉碎日本挑拨离间计划打破日封锁准备反攻》(5月27日)、《中条山展开激战共军协助向日军扫击》(5月29日)等。

从国民参政会中共代表出席问题,到晋南战役中共军队是否协助国民党军队抗日问题,《大公报》、《申报》的表现已如上述。它们俨然以‘国民舆论’的代言人自居,貌似公正合理,实则是有意识无意地配合了国民党的立场,在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上向共产党施压。应该说,《大公报》、《申报》的立场实际上又正是上一阶段观点和立场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更为露骨罢了。

## 四

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尽管《大公报》和《申报》在报道新四军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但绝不会料到会发生几乎使国共关系濒于破裂边缘可能葬送抗战大局的变故。正因如此,皖南事变的发生不仅搅乱了国内政局,也使得《大公报》、《申报》等素以资产阶级代言人著称的舆论工具一时深感焦虑和头痛。为何《大公报》、《申报》在皖南事变及其善后问题上配合国民党的立场,并向共产党施压?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国民党政权在当时毕竟代表了中国的‘正统’,具有一定的权威,对部分民众还存在着一定的吸引力。第二,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性质报纸中的排头兵,《大公报》的观点、立场对《申报》影响很大。如果说皖南事变前《申报》对新四军的积极报道,体现了它比较自由、开放、进步的特色的话,在事变后,其言论之谨慎,则很难再看到其原来的特色,相反,在言论上已难脱《大公报》影响窠臼。而《大公报》强烈体现了文人论政的倾向。主持《大公报》言论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深受现代资产阶级自由精神和

客观主义影响;但他们同时又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忠君爱国、拥护正统”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公报》所拥护的“正统”。所以,当蒋介石宣称解散新四军,是“整饬军纪、军令问题”;《大公报》就与之唱和,大肆渲染维护“国家中心”的重要性,“军令、军权”统一的绝对必要性。这种观点与其办报人的主旨是完全吻合的,某种程度上说,《大公报》配合国民党的立场也有其必然性。第三,皖南事变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自然被视为领导抗日的“中心”和“象征”。当国民党借“军纪”、“军令”为名,行一党之私制造冤案后,为防止统一战线分裂、维护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局着想,《大公报》、《申报》就只有“箴劝”共产党降低解决善后问题的条件,迅速实现国共和解以完成抗战大业。第四,受商业利益和参政议政观念的驱使,《大公报》、《申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指责和批评政府,但也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它不会也不可能以威胁自己的存在为代价。皖南事变后《大公报》、《申报》态度的变化,就很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毛泽东曾轻鄙《大公报》对国民党而言是“小骂大帮忙”;上述事实而言,这句话不难理解。但以客观而论,却不能说《大公报》的言论对共产党没有发生任何积极作用。就以皖南事变善后问题来说,在关于中共代表是否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当《大公报》、《申报》发起“箴劝”中共代表出席以维护团结抗战大局的舆论攻势后,在重庆的周恩来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曾向中共中央建议:“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现在全重庆都在等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sup>①</sup>再以中条山战役为例,当《大公报》发社评督促呼吁中共出兵援助中条山国民党军队时,周恩来不是有连夜复信予

---

①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5—226页。

客观主义影响;但他们同时又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忠君爱国、拥护正统”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公报》所拥护的“正统”。所以,当蒋介石宣称解散新四军,是“整饬军纪、军令问题”;《大公报》就与之唱和,大肆渲染维护“国家中心”的重要性,“军令、军权”统一的绝对必要性。这种观点与其办报人的主旨是完全吻合的,某种程度上说,《大公报》配合国民党的立场也有其必然性。第三,皖南事变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自然被视为领导抗日的“中心”和“象征”。当国民党借“军纪”、“军令”为名,行一党之私制造冤案后,为防止统一战线分裂、维护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局着想,《大公报》、《申报》就只有“箴劝”共产党降低解决善后问题的条件,迅速实现国共和解以完成抗战大业。第四,受商业利益和参政议政观念的驱使,《大公报》、《申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指责和批评政府,但也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它不会也不可能以威胁自己的存在为代价。皖南事变后《大公报》、《申报》态度的变化,就很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毛泽东曾轻鄙《大公报》对国民党而言是“小骂大帮忙”;上述事实而言,这句话不难理解。但以客观而论,却不能说《大公报》的言论对共产党没有发生任何积极作用。就以皖南事变善后问题来说,在关于中共代表是否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当《大公报》、《申报》发起“箴劝”中共代表出席以维护团结抗战大局的舆论攻势后,在重庆的周恩来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曾向中共中央建议:“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现在全重庆都在等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sup>①</sup>再以中条山战役为例,当《大公报》发社评督促呼吁中共出兵援助中条山国民党军队时,周恩来不是有连夜复信予

---

①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5—226页。